

红流纪事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前前后后

武国友/主 编 柳筱萍/著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文史出版社



红流纪事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前前 后后

武国友/主 编 柳筱萍/著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前前后后/武国友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3 (2011.7重印)
(红流纪事)

ISBN 978-7-5472-0465-8

I. ①中… II. ①武…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311号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前前后后

ZHONGGUOGONGCHANDANGCHUANGJIANDEQIAN
QIANHOUHOU

主 编/武国友
著 者/柳筱萍
出版人/徐 潜

责任编辑/康迈伦
责任校对/李洁华

装帧设计/柳甬泽 徐 震
印装/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94千字

印张/8

版次/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3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16 13578885062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0465-8

定价/15.00元

丛书主编/武国友

副主编/王绍强 陈毓述 史义军

著者/柳筱萍

编委会

主任/武国友

副主任/程舒伟 鲁晓红 王绍强

委员/周振华 赵丽君 杨兴朝 徐连英

智金华 殷明星 任曼劼 杨燕华

吴宝林 张宇英 马 铃

总 序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走过了长达28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我们组织编写了《红流纪事》丛书，以志纪念。

近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各类党史著作数以千计。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将一些重大事件独立写成本综合性的册子，合起来形成一套丛书，目前尚不多见。将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融合在一起，以此为骨架来展现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选择中共党史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需要做些筛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很多，我们这套《红流纪事》丛书所选之“重大事件”，只选择了民主革命28年历史当中30件大事，力求通过这30件大事大体上涵盖中共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这首先就遇到了选取哪些事件最为合适的问题。就我们的水平而言，很难说就一定能够选得那么准确、恰当。但总体设想是，应以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为主，有的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经验或教训。

在选取事件的过程中，除以上一些考虑之外，经过反复综合、权衡，觉得还应有下列标准：一是体现重要性。也就是说，所选事件要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二是注重代表性。所说的代表性，就是某件事可能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影响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它可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对这样的事件也选取了一些。三是注重平衡性。所说的平衡性有两层意思：其一，处理好事件与事件之间的

交叉。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因受事件独立性的限制，相互之间必须避免重复。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撰稿过程中，通过详略取舍的办法作了一些处理。其二，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共早期组织，工农运动、军事斗争，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各苏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各大战役，等等，都有所选取，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尽管作了上述一些考虑，但由于每一小册子都是以某一事件为中心独立成册的，所选事件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已出版的党史书籍。通过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直书。严格地说，这套书还不算是一套学术著作，而是一套近乎通俗性的读物。努力做到既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又力求文字朴实、通俗易懂，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目前这套丛书与我们的初衷还有一定距离，与读者的期望还会有很大差距，我们在此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谅解。当然，也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此书的同仁、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 者

2011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 引子	9 /
★ 一位北大教授的被捕	11 /
★ “南陈”和“北李”	19 /
★ 来自远方的关注	25 /
★ 五位神秘的“记者”	29 /
★ 陈独秀的惊喜	37 /
★ “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42 /
★ 渔阳里2号的“共产党”组织	48 /
★ 李大钊捐资创建共产党组织	55 /
★ 一间特殊的律师事务所	62 /
★ “光光眼镜店”里的争论	66 /
★ “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70 /
★ 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	73 /
★ 被日本警察盯上的中国人	77 /
★ “没有正式名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81 /
★ 两个外国人的“建议”	85 /
★ “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	91 /
★ 会议到底是哪天开幕的	104 /
★ 聚首望志路106号	110 /
★ 马林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116 /
★ 细雨中的嘉兴南湖画舫	120 /
★ 悄然回沪的中央局书记	124 /



引子

1921年7月23日，上海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大暑节气。因此，尽管是个周末，贝勒路一带的商铺门前也显得冷清了许多，铺子里的伙计们，摇着蒲扇，在酷热熏蒸下，大多昏昏欲睡。

似乎为了避暑，位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的一排4幢相连的石库门楼房的门也紧闭着。这幢楼房在当时、在当地还是比较醒目的，因为它在一年前刚刚建成。簇新的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着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当地人都称这里为“李公馆”。显然这幢建筑的主人不会是个一般的人物。房屋的主人叫李书城，他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显赫人物。他

23岁追随孙中山参与筹备和组织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武昌与黄兴并肩战斗，任武汉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总统府军事秘书兼陆军部顾问。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等战争。1920年，李书城回上海暂居时，买下并修葺了这套住宅。这幢大宅子从外表看是4幢紧邻的建筑，但是，当初为了便于生活，李家将4幢小楼内墙打通，楼梯合一，组成一家。其中的106号楼上是李汉俊卧室，楼下客厅约18平方米。

1921年的这个夏日里，李书城恰好不在上海，当时湖北人民不堪忍受北洋军阀王占元的残酷统治，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李书城毅然赴鄂参与领导这一运动。在离开上海前，他把家托付给了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弟弟李汉俊。而就在李书城离开上海的这段时间里，在他家18平方米的客厅里，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一位北大教授的被捕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能不谈到两个关键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即“南陈北李”。

1936年，毛泽东在与探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

“1921年农历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

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讲这话的时候，李大钊早已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陈独秀则正被蒋介石关在南京监狱中。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充分肯定了“南陈北李”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8日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李大钊，幼年学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陈、李两人，相差10岁，性格很不一致。李大钊身材高大，态度温和，平顶头，椭圆脸，浓密的八字胡须，像漆一般黑。陈独秀中等身材，态度严峻，词锋犀利，像一股烈火。1915年，袁世凯大搞帝制的复辟活动，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陈独秀这时刚从日本归国，他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和革命勇气，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著名的《新青年》。

那时李大钊尚在日本留学，闻听袁世凯的卖国罪行，留日学生纷纷集会，李大钊受留日学生总会的推举，愤怒地执笔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1916年1月底，为联系反袁事，李大钊离日回国。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蔡到校不久，为物色各科人选，经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陈独秀到北大后，《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

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开始和陈独秀在一起共事。8月，沙滩红楼新校址建成，图书馆于10月间从原来的马神庙搬到那里。为了让北大师生能够不间断地借到书，李大钊决定“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上仍在旧舍开馆”，并且大量增购中外图书，尤其是那些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文化的园地。

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还创办了另一个著名刊物《每周评论》，进一步点燃了新文化的烈火。

陈、李两人交谊很深。李大钊对陈独秀很尊重，总是称他为仲甫先生，不叫他的名字。他常对人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走出书斋走上街头，积极投身群众的革命运动。

但是刚刚走出书斋的陈独秀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被捕的经历。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军警狂捕游行学生，尽管经过多方努力，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但是，6月3日和4日，又有近千名学生被捕。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商人开始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五四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把斗争引向深入。

6月9日，他们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和京畿卫戍司令部两个机关，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要对北京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

《宣言》起草完后，陈独秀把它交给了老乡胡适，由胡适译成了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当晚陈独秀与高一涵前往该处，印刷所内的两位工人警惕性也很高，事毕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传单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陈独秀想试探一下市民对《宣言》的反映，于是他和友人首先来到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时值暑假，市民多在午后去中央公园转转，吃茶的，乘凉的，会友的，十分热闹。陈独秀和友人将一张张传单放在公园没有人的桌上，用茶杯压好，然后在一旁悄悄等待。等到

吃茶的人回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他们就在远处偷着高兴。

传单在中山公园受到的欢迎，使陈独秀在更大范围进行宣传的信心更足了。永安路北侧香厂路的新世界游艺场，成了下一个散发传单的目标。

6月11日，下午7时，陈独秀受友人之邀，来到新世界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聚餐，他随身带了千余份传单。晚餐后，约8时多，陈独秀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艺场。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潜入了第五层的屋顶花园，那里既无游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10时，恰好四层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趁此良机，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凭空一挥，大把的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人群一片骚动……

陈独秀没有料到，此刻危险正向他逼近，新世界早已布满了密探。几天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了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于是警察署立即加派了区警署侦缉队的便衣侦探，每天晚间分布在各楼严密侦查。此外，步军统领衙门也安排了密探严加防范。弹丸之地的新世界，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进入新世界后，“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因上下楼频繁，而且衣服兜中显现膨满之物，引起了侦缉队两名便衣侦探和步军统领衙门一名密探的注意和跟踪。当陈独秀在5楼屋顶花园准备再次抛撒传单时，一伙埋藏在暗处的探员立即拥出，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因新世界处于闹市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12时，数百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住宅，

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共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当陈独秀押送至中途时，步军统领衙门密探与警察署探员发生了争执，他们都想将陈独秀送往自己的部门进行处理，由于当时区警察署的便衣人数比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探多，陈独秀才被送至警署解至警察厅。后来，步军统领王怀庆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发生争执，王怀庆想以治安妨害绳以军法，吴炳湘想以违反警律处置，争执到徐世昌大总统那儿，徐总统以送法庭判决结束争执。王怀庆是何许人也？他是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6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与之相比，吴炳湘是安徽同乡，态度也较为缓和。幸亏吴炳湘的坚持不让，否则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

在“五四”这个敏感时刻，陈独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各大报刊、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汹涌的营救浪潮席卷而来。

6月13日，北京《晨报》等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学界和教育界立刻行动起来了。

15日，在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提出两点意见：其一，陈独秀在全国学界享有盛望，他从不隐瞒个人的言论思想，国内外都知道，这次以嫌疑加罪，会再次激起全国学界波澜，而在此学潮激荡的时刻，还是大事化了为好；其二，陈独秀向来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而被一般守旧学者嫉恨，此次忽被逮捕，国内外人士都会怀疑是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

以滋纠纷。

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名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知名教授40人，致函警察总监，指出，查陈独秀此次行动，如果真如报纸所载，可能不免有越轨之嫌，但是他的本来用心无非基于书生爱国的愿望。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本着维持地方秩序、息事宁人的态度，对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宽爱之心。

共同起草《宣言》的李大钊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学生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四处传播，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压力营救陈独秀。23日，北大学生黄昆仑致信全国学联，请求声援。

陈独秀的同乡士人也纷纷登上了营救舞台。陈独秀是安徽人，北京、上海等地的同乡故友，在皖的各界名流，纷纷奔走游说。6月19日，余裴山致函安徽协会。25日，安徽同乡会吴传绮等8人联名致函警察总监吴炳湘，要求释放陈独秀。

26日，胡适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

陈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也很着急。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他郑重地提出了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之事。他对许世英说：“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说，口口声声地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游说力量还闯入了总统府。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先生的儿子严智怡带着父亲的手书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大总统，徐世昌开始以